
淮北河网化运动及其启示¹

孟宪科

(菏泽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菏泽 247015)

【关键词】: 水利建设; 淮北地区; 河网化; “大跃进”; 水利工程

【摘要】: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 全国许多地区掀起了河网化运动。人们希望通过构建纵横交错的河网达到蓄水、排涝、抗洪、灌溉甚至种植水稻等多重目的, 为此, 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修沟挖渠, 尤以淮北地区最为典型。河网化期间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 有些一直施惠于今, 有些则很少甚至没有发挥作用, 造成了很大浪费。认真研究这一时期的河网化运动, 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这段历史, 而河网化的兴衰成败也能给我们以历史启示。

【中图分类号】: K27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 (2018) 01-0136-0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国的水利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是中间也遇到一些挫折。对于中国水利发展的研究, 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 但是有关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河网化”运动的研究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相关研究, 多是当时之人所做, 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如王维第、瞿兴业的《河网化——平原治水科学技术的新发展》, 王遵亲、刘文正、尤文瑞的《河网化与排水种稻是改良华北平原地区盐渍土的主要途径》, 李大爽、黄婉珍的《淮北平原河网化库容标准的初步研究》, 郑哲仁的《豫北原阳洼涝盐碱地区河网化的初步研究》等。后人的研究, 除了赵筱侠《“大跃进”时期江苏省的梯级河网化运动》一文是对江苏的河网化运动进行的专门研究外, 其他多是在涉及“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时附带提及, 这不能不说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最为典型的淮北地区河网化运动, 基本无人问津。很显然, 这无助于我们清楚认识这段历史, 也无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事业的发展。

基于此, 笔者不揣鄙陋, 试图通过审视这段历史, 为中国水利建设及“大跃进”的研究作出一点贡献, 并籍此带来一些历史启示。

一、淮北河网化提出的背景

淮北河网化的起源和三件事紧密相关, 一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江河灾害的治理, 一件是 20 世纪 50 年代蓬勃兴起的兴修水利运动, 一件则是“大跃进”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洪涝灾害十分严重, 尤其是 1950 年的淮河洪水, 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触动很大。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 要求从当年秋天起, 组织大规模的导淮工程, 由此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大江大河的治理工作。

¹**【基金项目】**: 菏泽学院博士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大农业思想的传承发展与农业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XY16BS18)

【作者简介】: 孟宪科(1967-), 男, 河南浚县人。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E-mail: mengxk@126.com

治河伊始，人们首先看到的是洪水的威胁，将治河重点放在了防洪方面，修堤筑坝是当时的主要任务。1952年夏天，淮河流域又发生了严重涝灾，仅安徽淮北地区就有1396万亩田地受涝，这时人们开始关注内涝的问题。11月份，治淮委员会召开豫、皖、苏三省治淮除涝代表会议，制订了“以蓄为主、以排为辅，采取尽量蓄、适当排，排中带蓄，蓄以抗旱，因地制宜，稳步前进”的治涝方针。此方针经治淮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最后也得到了中央的认可，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效果并不理想。1956年，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涝灾，受灾面积达到2866万亩。总结这一时期治涝不够理想的原因，有人认为虽然提出了“以蓄为主”的方针，但是实际做的不够。按照当时安徽省水利电力厅厅长张祚阴的解释，主要是“所做工程绝大部分都是挖河排水，挖沟也是排水，以蓄为主的思想是不明确的”^①。

1957年，以蓄为主的思想逐渐占据上风。中共中央根据各地的经验，并参照苏联专家的意见，逐渐明确了“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治水方针。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淮河流域治理工作会议。会上，谭震林建议：“淮河以北的冀、鲁、豫、皖、苏地区能否变成水网地区，以种水稻为主。关于治淮方针，应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必要时修一些大型的，依靠合作社为主”。此提议首先得到治淮委员会和阜阳、蚌埠两专区水利部门的响应，他们开始进行淮北水网化的规划工作。所以说，河网化一开始是和“以蓄为主”的方针紧密联系着的。

与此同时，从五十年代开始，全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兴修水利运动，安徽也不例外。1957年，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发布了《关于立即开展轰轰烈烈的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的指示》，要求保证70%以上的劳力投入冬修，并将原定全省水利兴修土方任务从4.3亿立方米增加到8亿立方米；要求新增灌溉面积917万亩，新增和改善排涝面积995万亩。

就全国而言，在解决内涝及早涝灾害迭发问题的过程中，天津和淮北一些地方曾经在洼地地区通过构筑河网的方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这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为了解决当时黄淮海平原及东北辽河平原的内涝以及迭发的旱涝灾害问题，中央考虑把这些经验进一步推广。

就安徽而言，濉溪县的卧龙湖地区应该是较早进行河网化实验的。卧龙湖位于濉溪县西南，面积6平方公里，原本是芦苇丛生的荒湖，为了变荒湖为良田，从合作化时期就开始治水，但因力量薄弱，只重视排涝，所以每年发生的水灾仍不能免除。1956年春，当地党委决定推广安徽省委提出的“三改”^②办法，在这一地区挖沟、圈圩蓄水，改种水稻213亩，并且获得了304斤的好收成。1957年继续治理蓄水工程，扩大水稻种植面积，挖干沟37条，圈圩21处，建涵闸两座，在淮北形成了第一个河网化雏形，水稻也连年增产。1958年，卧龙湖地区又组织了农业社协作，集中8000劳力，采取大兵团作战方式，夜以继日，大干一冬春，基本实现了河网化。为此，安徽省委和中央先后组织学习卧龙湖治水经验，号召把卧龙湖经验推向全省、推向全国。

1957年冬修开始后，安徽省、地、县、区、乡都是主要领导亲自抓，各地任务指标定的都很高，强迫命令和虚报浮夸之风开始盛行，由此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而“大跃进”又进一步把水利建设推向高潮。原定的8亿立方米土方任务很快被完成，安徽省委决定再增加8亿，至1958年1月底，增加的8亿又“胜利完成了”。中共安徽省委决定趁热打铁，再加8亿。安徽日报为此发表了《八亿、八亿、再八亿！》的社论，并逐日公布各地的兴修进度。根据公布的数字，至1958年2月24日，全省兴修土方已经突破24亿立方米，至4月7日，土方突破了40亿立方米。兴修水利过程中纵横交织的沟渠为河网化奠定了基础，而所谓的巨大成绩也为各地大搞河网化提供了依据。

二、河网化运动的开展

1958年3月16日，中共安徽省委在蚌埠市召开了3300余人参加的淮北地区干部大会，省委书记曾希圣在会上明确提出了淮河水网化的要求。他说：“解放以来，我们最苦恼的水旱灾害问题，每年治淮做了不少工程，取得不少成绩，但也走了一些弯路。直到今年，才找到了一些直径，找到了治理淮河流域的根本办法。这个办法可以归纳为以下的几句话，即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全面规划，全面治理；小型为主，大中支持；以蓄为主，尽量少排；水网化，水稻化，把淮北变江南。”^②

在这次干部大会上，安徽省委与治淮委员会共同编制了“淮北水网化的十条规定”，提出了淮北河网化的基本思路。此后，淮北各地纷纷行动，开启了“水网化”的序幕。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治淮委员会主任谭震林到淮北视察。视察后，谭震林指出：“水网化是我国平原地区最完善的治水办法，应该进一步规划，把水网化变为河网化。今后河网化应该达到更高的要求，就是一年不雨也要保证不旱，降雨 1000 毫米也要保证不涝，所有河网都要通航轮船”⁽²⁾。由此，水网化的说法被河网化所取代。

不久，在治淮委员会和安徽省水利厅的共同努力下，《安徽省淮北河网化初步规划》正式出笼。规划要求从 1957 年冬到 1959 年底，利用大约三年时间，将淮北 2750 万亩旱地改为水稻田，其他旱地全部改为水浇地，实现淮北水稻化、江南化，达到 70 天不雨不旱，5 天降雨 400 毫米不涝；县县通轮船，乡乡通木船，社社通小船或木盆。

规划要求疏浚原有 15 条河道，开挖新河 9 条，构成大河网。再开挖大、中、小沟，连同各地的水塘构成基本水网。为满足灌溉需要，各河道还需要节节建闸控制蓄水。不仅如此，根据河网化通航的规划，要求淮河干流、界洪新河、符怀新河等河道通航 1000~3000 吨的一列拖驳；颍河、涡河、阜蒙新河通航 500~2000 吨拖驳；其余各河通航 150~1000 吨拖驳；各河道的节制闸分别建船闸或临时过闸设备；大、中、小沟都要通民船。规划还要求利用河网开发水电，计划建小水电站 20 处，装机 2.5 万千瓦，年发电量 1 亿千瓦小时。除此之外，河网化后，要求在常年水域养鱼和发展水生养殖，在堆土区则要求植树绿化。

规划指出，实现河网化后，按照“水稻化、淮北变江南”的要求，拟定发展水稻田 2750 万亩，水浇地 1520 万亩。

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跃进”形势进一步高涨，中共安徽省委及阜阳、蚌埠两专区都对河网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安徽省水利电力厅对治淮委员会编制的《河网化初步规划》进行修订，于 1958 年 11 月提出了《安徽省淮北河网化规划》。修订的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进一步提高治理的标准；二是修改河网规格。关于河网规格，规划提出，河网由五级河道组成，一级河道口宽 60 米、底宽 30 米；二级河道口宽 50 米、底宽 20 米；三级河道口宽 40 米、底宽 10 米；河深均为 6~7 米。大、中沟改名为第四、五级河道，其深度、宽度不变，间距改为：大沟每隔 1 公里 1 条，中沟 0.5 公里 1 条。并认为，每平方公里挖土方 35~40 立方米的布置是可以采用的。

1958 年冬至 1960 年春，是大干河网化的两年。淮北各地集中力量挖大河网，规划的 9 条新河中，除涡浍新河未动工外，8 条新河全部开工。各县自行规划的大、中新河也陆续施工。

在河网化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付出了艰辛劳动。据统计，在淮北河网化运动期间，每年最高上工人数为：1958 年 380.7 万人，1959 年 309.1 万人，1960 年 156.4 万人，1961 年 55.4 万人。到 1962 年，共治理河道 49 条、1165.4 公里；疏浚排水河道 8 条、543 公里；开挖排水大沟 56 条、663 公里；增加蓄水库 28 座、蓄水量 6772 万立方米；增加机电排灌站 87 座、装机 18489 千瓦；圈圩 27 处、面积 19.8 万亩；建涵闸 553 座，其中流量 1000 立方米每秒的水闸 5 座、100~1000 立方米每秒的水闸 45 座，河、沟、库、塘总蓄水量增加 59675 万立方米。据 1962 年 12 月安徽省水利电力厅《淮北河网化调查研究总结》所作的调查，共挖河网 2966 公里，做土方 7.18 亿立方米，其中基建土方 2.9 亿立方米。

到 1960 年，淮北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已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淮北河网化已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安徽省在该年冬修计划中提出“以较少劳力，按低标准完成骨干河网，使其发挥效益；继续完成河道上大、中型控制建筑物及船闸，继续新建机电排灌站及其配套工程”和“花钱少、出工少、受益大，当年工程当年受益”的原则。1961 年 8 月，安徽省水利电力厅编制了《安徽省淮北地区 1961 年至 1970 年初步水利规划报告》，降低了标准，强调因地制宜，对排涝考虑较多，实现河网化的期限也推迟到 1970 年。不过，由于当时紧迫的经济形势，规划未来得及付诸实施。

1960 年冬至 1962 年春的两年中，对于已经开工的一些涵闸和抽水站工程，开始依靠水利专业队伍施工，依靠群众施工的河网土方工程基本停顿。1962 年，河网化在遗留大量尾工的情况下最终停止。

三、河网化运动的结果

不可否认，淮北的河网化运动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1959年麦收以后，阜阳地区遭遇严重旱灾，至8月中旬，干旱面积达到1700万亩，河网化发挥了一定的抗旱作用，全区灌溉用水十之五六取自河网。在一些地区，河网也为提水灌溉提供了方便，“如果没有做河网工程，则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做临时工程取水，至少需要提水工具320万部，约需640万人，估计比现在增加劳力340万人，连自流灌溉及减少一级提水约可节省劳力480万人”⁽³⁾。这个数字也许有所夸大，但是情况也确实存在。

再如，1958年7月，淮北地区10天内降雨量达320毫米，北部五个初步河网化的县区基本上未受涝灾。1959年7月至9月，淮北、苏北地区发生旱灾，有的地区旱情延续到100天以上，通过河网拦截取用了外来水、当地径流、地下水、回归水等各项水源，一定程度上解决了500万亩稻田用水及2000万亩旱作物抗旱用水。“在实现河网化的地区，完全满足了抗旱用水，保证了丰收。”⁽⁴⁾所以，当时的《水利学报》宣称：“两年来的实践证明，河网化对解除内涝威胁、解决排水矛盾及充分利用当地水利资源，解决灌溉用水问题起着巨大的作用”⁽⁵⁾。虽然言之过誉，但也不全是无的放矢。

又如，从1961年起，按照“批判、改造、利用”的原则，对前一阶段的工程进行调查、鉴定，对遗留的半拉子工程进行了必要的改造，对水利基本建设资金也进行了集中投入，并合理规定水系，原来的很多工程还是起到了除涝、蓄水、灌溉的作用。改造后的纪伦寨河网被誉为“淮北一枝花”；固镇县实施的“大中小沟除涝，台田、条田防渍”的农田水利工程也收到良好效果。从1962年起，沿淮、沿江的一些县兴建的一批电力排灌站，蚌埠、阜阳、蒙城等在淮河干支流上兴建的节制闸相继竣工，发挥了既能蓄水又能排洪的功能。

另外，在当时河网化运动的背景下，一些著名的水利工程应运而生。在安徽，最为典型的莫过于西部的淠史杭水利工程。其设计灌溉面积1200万亩，兼有发电、航运、供水、水产养殖和改善生态环境等多重效益，是当时规模位居全国第二的大型灌溉工程。在水利建设的过程中，安徽人民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共开挖各级渠道10300多条，总长24700多公里；兴建各类渠系建筑物近30000座，中、小型水库1200多座，机电灌站和外水补给站683座，完成土石方近5亿立方米，形成了长藤结瓜式的灌溉系统，灌溉面积达800多万亩，其发电、航运、城镇供水和水产养殖等综合效益也十分显著。许多专家、学者把淠史杭灌区称为中国水利建设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河网化带来的问题可能更多。河网化是在淮北地区治水以蓄水为主的思想指导下，以大规模推广水稻种植和通航为目的实施的大型水利工程。当时一下子规划了界洪、界南、阜临、阜蒙等10余条新河，刮起挖河风、造塘风，工程摊子大、战线长、问题多，“一些河、塘、站成为半拉子工程，造成土地、资金、人力的巨大浪费”⁽⁶⁾；“蓄水为主方针在山区是基本可行的，但将其机械地搬到平原地区后，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危害”⁽⁷⁾。在淮北平原开挖纵横交错、相互沟通的河网，打乱了原有水系，虽然有些时候可以疏浚河道，起到防洪除涝的作用，可是，由于地势高低的不同，也会造成一些地区的堵塞和积水，更会引起地下水位的上升而造成次生盐碱化；不经协商在省界新老河道上节节建闸蓄水，造成了上下游河道排水矛盾和水利纠纷；广泛种植水稻，在江北的许多地区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生产技术和习惯方面，都不是轻易可以实现的，1959年大旱，已改种的水稻因缺少灌溉水源而大部分枯死；水力发电，且不说当时有没有足够的相关设备，即使能够建成一些小型电站，其实用性和持久性都是值得怀疑的；巨大的土方任务，远远超出淮北人民的承受能力。再如开挖的阜蒙新河，开挖的时候就在阜阳地区，而阜阳地区有着发达的水系，开挖阜蒙新河，灌溉、交通运输的意义都不大。

中国水利部在对新中国水利进行总结时即讲到了淮北河网化对全国的负面影响，“那个年代曾将‘大跃进’时淮北地区的节节拦蓄、‘一块地对一块天’及大搞河网化的做法推广到易盐碱的冀、鲁、豫平原和黄、淮、海平原。加上当时大搞引黄只灌不排，造成一灌、二堵、三淤、四涝、五碱的严重涝碱灾害，产生黄淮海平原地区大面积的次生盐碱化”⁽⁸⁾。据位于这一地区的浚县《水利志》记载：河网化开始以后，水利工程遍布全县，“在河道上节节拦蓄，兴渠废井，盲目引黄，大水漫灌，造成水井破坏，地下水位上升，全县三分之一的耕地出现次生盐碱化”⁽⁹⁾。为此，河南省委1961年发布指示，要求“平原以排为主”，并提出“挖河排水，打井灌溉，植树防沙，水土保持”十六字方针。

当然，河网化对全国各地的影响不尽一致。有些地区在河网化的实施过程中，比较注意本地的实际，消极影响相对较小。例如，江苏省根据本地特点、按照梯级控制原则开展了梯级河网化运动，事前经过了一定试点，“大跃进”后也进行了一定调整，虽然也有河网化运动带来的普遍问题，但“为全省河网骨架奠定了基础”^{〔10〕}，“带来了水利面貌的大变化，在抗御水旱灾害中发挥了很大效益”^{〔11〕}。

但是，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河网化带来的问题不少。在河网化的实施过程中，许多设想天真而无具体规划，不少项目一哄而上，顾此失彼，许多时候边规划、边设计、边施工，有的甚至未经规划、设计就盲目施工，因而出现规划设计不当、工作多变、施工质量差、返工多、浪费大等一系列问题。大河网的9条新河及各县的大、中新河，由于土方任务太大，除了土方数量虚报外，挖得大都深浅不一、宽窄不等、断断续续，未能按计划的断面全线贯通。许多新河遗留的土方工程较大，缺桥涵，堵坝多，既不能灌，也不能排。

在疏浚旧河开挖新河的同时，一些水利枢纽也开始建造。淮河干流上的临淮岗枢纽和蚌埠闸都于1958年开工，临淮岗枢纽于1962年4月停工，未能发挥作用。另外，在淮河各支流及大、中新河上兴建了大量涵闸。颍河上建设阜阳闸和颍上闸，阜阳闸建成比较顺利，而颍上闸1959年浇了底板后，1960年因财力、物力不足而停工，后于1978年复工。涡河上建成了蒙城闸和涡阳闸，其中蒙城闸1958年2月开工后边设计、边施工，于当年7月建成，由于设计、施工不当，至7月14日蓄水不久即倒塌，后于1959年1月重建。亳县大寺闸于1958年2月开工，做了部分底部工程，因经费、材料困难，于1961年停工，后于1976年11月复工。这两年所建的闸都是按淮北实现河网化、水稻化后的条件设计的，排水量偏小，严重制约水的流通。至于大量的小型涵闸，大都工程质量差，设备不配套，难以发挥效益。

应稻改的需要，当时还兴建了一批机电灌电站，除沿淮灌溉水稻并结合排涝的站，如怀远县的上桥、茨荆等站效益较好外，不少站是为了稻改而建，以后不种稻了，灌溉旱作物又不习惯，也就失去了作用。还有些站，如颖上县王桥站、阜南县谢家桥站、宿县唐南站、凤台县桂集站，由于水源不落实，成了“旱站”。

在整个河网化运动的过程中，广大群众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从1959年起，淮北地区饥饿状况就已经相当普遍。广大的农民以浮肿之身、挨饿之躯去应对艰辛的劳动，而一些干部仍然不断给群众加重任务，其结果事与愿违，给国家的经济、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12〕}。

四、河网化运动的思考与启示

毫无疑问，河网化是当时人们治理洪涝、发展生产的一个美好理想。在此过程中，许多干部群众也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努力，但却带来诸多问题，其成败得失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首先，我们做任何事情时都要认真考虑理想变为现实的可能性问题。防洪除涝、种植水稻、水力发电、水产养殖、堤防绿化等固然是河网化追求的一幅美丽画卷，可是如此美妙的设想是否能够最终实现，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进行认真分析。在规划构建河网时，人们往往只看到河网的防洪除涝作用，而不去思考由于地势高低差异、河渠宽窄不一以及水中泥沙沉积可能带来的堵塞和积水。在蓄水问题上，机械地照搬“蓄水为主”的方针，不考虑平原与山区的不同特点。只盼望种植水稻增加粮食产量，却不去分析江北地区的自然条件、生产技术和生产习惯。大力倡导水力发电，却没有对机器设备、水文条件进行认真论证。至于水产养殖、堤防绿化等，也都没有认真考虑能否真正变为现实。

其次，一切建设必须考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河网化是一场声势浩大却又十分艰巨的工程，完全依靠当时还十分落后的劳动方式，没有机械和先进设备，在短时间内很难完成，最后就不得不进行浮夸。例如，当时据淮北两专区统计，土方工程日平均工效为每工日挖土4.1立方米，但在制订冬修计划时，却按每工日挖土方20方来安排任务，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从几十个试点工地推算，平均工效只有2立方米”^{〔10〕}。但是，下达的任务总是远远高于能完成的数目。由于完不成任务，人们就不

得不谎报、浮夸。

再次，所有的建设必须认真规划。在河网化实施的过程中，由于设计理想化，而操作却无具体规划，导致许多项目一哄而上，顾此失彼。加上许多规划设计粗糙，边规划、边设计、边施工，有的甚至未经规划、设计就盲目施工，因而普遍存在规划设计不当、工作多变、施工质量差、返工多、浪费大等一系列问题。淮北河网化仓促规划了 9 条新河，各县又有自己的大小河流需要开挖，任务太多，很难真正完成，由于仓促上马造成的半途而废比比皆是。

最后，我们必须时刻关注人民生活。悠悠万事，民生乃大。河网化设想出的是一幅美丽的画卷，这幅画卷也是一幅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画卷。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一直是我们的追求，也是河网化的最终目的。但是，在河网化的过程中，广大群众的生活长期陷入困难，这违背了河网化的初衷。我们不否认民众在艰难中追求美好的斗志，但是，在奋斗的过程中一定要时刻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要把群众生活的改善与否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试金石，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我们工作的真正追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取得伟大的胜利。

注释：

① “三改”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提出的农业生产三项改革措施，即改变季节收成、改种高产耐水作物、改变耕作习惯。

参考文献：

- (1) 张祚阴. 关于安徽省河网化的报告 (J). 中国水利, 1958, (8): 31-35.
- (2)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安徽省志水利志 (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9: 135-136.
- (3) 安徽省阜阳专署. 河网工程抗旱建奇功 (J). 农田水利, 1959, (12): 18.
- (4) 王维第, 瞿兴业. 河网化——平原治水科学技术的新发展 (J). 科学通讯, 1960, (14): 421-424.
- (5) 关于河网化科学技术问题 (J). 水利学报, 1960, (1): 6-9.
- (6) 吴敬人, 主编. 阜阳地区志 (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6: 285.
- (7) 王瑞芳. “大跃进”运动前后“三主”治水方针的形成与调整 (1).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3, (1): 71-78.
- (8) 张岳. 新中国水利 50 年 (J). 水利经济, 2000, (3): 1-16.
- (9) 浚县水利志编纂委员会. 浚县水利志 (M). 郑州: 黄河水利出版社, 2009: 5.
- (10) 赵筱侠. “大跃进”时期江苏省的梯级河网化运动 (J). 江苏社会科学, 2011, (6): 209-216.
- (11) 陈克天. 梯级河网化建设 (J). 江苏水利, 2000, (9): 47-48.